

“彼时彼地，我和我的人民在一起”

——论肖洛霍夫创作的人民性

侯玮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是苏联文学杰出成就的代表。这位经典作家之所以能够历经时代变迁的考验，依然在大众心目中焕发出恒久的魅力，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创作的人民性。肖洛霍夫创作的人民性源于他“为人民”的创作初衷。他带着为人民写作的规划走入文学并终其一生都没有背离自己的创作目标。他对历史与精神真理的无畏追求为艺术创作树立了难以超越的典范。肖洛霍夫创作的人民性体现在其作品的真实性上。他的创作以异常敏锐的洞察力和极其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多维度多层次地反映了整个宏大的历史时代的伟大场景，证明了人民在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的生命力和推动力，而且揭示出普通人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心灵的矛盾性，展现了历经无数创伤而走向幸福、越过一切不幸而走向最高道德价值的人民的主题。肖洛霍夫创作的人民性还表现在他的作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阅读、在不同社会阶层及文化等级中取得的巨大成功上。

【关键词】肖洛霍夫；人民性；真实性；普及性

【中图分类号】I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8)01-0079-04

DOI:10.13761/j.cnki.bflc.2018.01.015

当我们站在“十月革命”胜利百年的历史关口，回顾苏联文学走过的风雨岁月，会发现在复杂难辨、众说纷纭的文坛现象、作家队伍中，有一个名字几乎赢得了所有读者与作家——无论他是持何种政见、来自境内还是境外——的喜爱和景仰，这就是米哈伊尔·肖洛霍夫。这位经典作家之所以能够历经时代变迁的考验，依然在大众心目中焕发出恒久的魅力，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肖洛霍夫创作的人民性。

在美学范畴中，“人民性”概念具有多义性，有关它的内涵与外延曾经在评论界引起长期的争辩，未有定论；也曾出现过人民性与阶级性或者阶层性、人民性与民族性等概念的混淆。我们这里所认为的人民性，就是承认艺术创作是为了人民，艺术要真实反映人民的生活及人民的世界观；与此同时，人民也应当是艺术创作的主体，人民的语言、历史及文化必然推动艺术创作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肖洛霍夫的创作以其所触及的人群的广度、所反映的历史的长度，以及描写这一切的真实性、深刻性、全面性，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性。

一、为人民——肖洛霍夫的创作初衷

1965年，肖洛霍夫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在

瑞典举行的颁奖典礼上表示“我一直认为，我这个作家的任务是，以我过去写的和今后写的一切，贡献给这样的劳动人民、从事建设的人民、英雄的人民，因为这样的人民不侵犯任何人，但是一向能够庄严地捍卫自己创造的成果，捍卫自己的自由和荣誉，捍卫按照自己的选择建设自己的未来的权利。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帮助人变得更好，心灵更纯洁，能唤起对人的爱，唤起积极为人道主义和人类进步的理想而奋斗的愿望。如果我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我就是幸福的。”^[1](pp.865-866)]这段话深深道出了肖洛霍夫整个的创作初衷——怀着一颗真诚之心为人民而写作。他带着这样的规划走入文学并终其一生都没有背离自己的创作目标。

那么，肖洛霍夫所理解的人民是怎样一个概念呢？“用自己的手和脑创作一切的人，就是劳动的人。我也和许多作家一样，认为能够不受任何限制地用自己的笔为劳动人民服务，是自己的崇高荣誉和崇高自由”^[1](p.865)]。肖洛霍夫就来自他所说的这样的劳动人民。他生活在他们中间，而且无论自己的地位如何，都对他们不离不弃，永远为他们代言。正如阿赫玛托娃在《安魂曲》中所言“不，不是在异国的天空下，也不是在陌生的翅膀下，——彼时彼地，我和人民在一起，和

【收稿日期】2017-11-12

遭遇不幸的人民在一起。”^{[2] (p. 312)} 肖洛霍夫坚守俄罗斯文学的道德和责任意识，从来也没有把文学当作消遣和娱乐的工具，也没有躲在自己的书斋中虚构和幻想。他的创作总是与人民生活、与人民历史命运的重大转折同步。对于他来讲，作家不仅是一种职业，还是一种为人民发声的有力工具。肖洛霍夫的作品写的是顿河哥萨克，所以很多人都以为他就是一名哥萨克。实际上，他的一家是从梁赞省迁居到顿河地区的。从此，他就把自己的生命和创作都全部融入顿河的土地上。哥萨克人的传统习俗、他们的性格、生活都成为作家创作取之不竭的源泉。1920年，顿河建立苏维埃，他才15岁就开始积极工作，当老师，做宣传员，写剧本，参加征粮队。无论是在自己的家乡，还是游历城市与乡村；无论是到莫斯科学习写作，还是在卫国战争期间，作为战地记者奔赴前线，他都对人民和他们的生活表现出持续不断的兴趣。他始终都像一个战士，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不会袖手旁观，而是迅速干预，不怕影响自己的关系，不怕得罪上级领导；同时又把这些问题连同自己的思考写入作品。即便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即便是当选苏共中央委员，他都生活在普通百姓中间，不仅积极地参与文学生活，还积极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因为重病在身而不得不远离社会活动，但依然能够令人民感受到他就在“俄罗斯的深处”^{[3] (p. 2)}，他的名字永远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连。

肖洛霍夫作品的无尽源头——是生活。他以同时代人的身份走入生活，经历暴风骤雨的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卫国战争的转折年代，他是带着所有源于生活的思想、具有鲜明个性的形象进入文学史的。他是时代忠实的记录者，他所汲取的事实材料都带着亲身经历的新鲜感和熟悉感，因此，他在知识领域不输于任何一个方志学家、历史学家、民俗学家、民歌家等。这些知识照亮了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天才，在细节性和完整性上构筑了作品中毋庸置疑的生活氛围。另外，肖洛霍夫的作品真正拥有一种全民族的意识，他把对于俄国革命的命运和社会历史的思索推向中心，回答了同时代人最迫切的、关系到每个人自身最直接利益的重要问题，表达了他们的渴望和需求，使读者对作家产生极大的信任。著名作家卡扎科夫叹服“肖洛霍夫是你真正值得信赖的朋友，因为他从不会欺骗你，他令人钦佩地真实和诚实……他为我们这些生活和创作上都与他同时代的人建立了伟大的功勋。肖洛霍夫不仅令人惊叹，而且教会了我们什么是艺术。”^[4] 舒克申也坦承“肖洛霍夫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发现……我见到的他是什么样子呢？非常的深刻、睿智与朴素。对于我来说肖洛霍夫是编年史家的化身，他完全颠覆了我的看法。他使我认识到——不是用语言，而是以其自身作为榜样、其对维申斯克和整个文

学生活的参与——不要急于去追求艺术上的什么纪录，应当去寻求平静与安静，为了更加深入地思考人民的命运。”^{[5] (pp. 235 - 236)}

要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而写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需要极大的担当与牺牲精神，别尔佐夫认为：“不是所有作家都能承担起这样的责任。这不仅需要艺术上的天才，而且更需要有作为一个公民的勇气。”^[6] 这也决定了肖洛霍夫的一生是充满矛盾痛苦的悲剧性的一生。但他终究以自己的创作和行为榜样重建了革命年代与和平年代的精神与美学价值体系。他对历史与精神真理的无畏追求为艺术创作树立了难以超越的典范。作家卡塔耶夫在1936年去世前所言准确地指出了肖洛霍夫的威望之所在“我以为，肖洛霍夫是我们中间唯一一个活得如他被需要的那样，有时我觉得，他一个人是为了我们所有人工作。”^{[7] (p. 186)}

二、写人民——肖洛霍夫创作的真实性

肖洛霍夫的小说创作是苏联文学最优秀成就的代表，按照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的分析，正是从肖洛霍夫开始了“新的人民的小说”。他用自己的天才稳固和继承了俄罗斯经典文学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在苏联文学中创立了“肖洛霍夫流派”，确定了它以真实性为核心的人民性和民族性。托尔斯泰在短篇小说《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中写道“我全心全意所热爱的、竭尽全力创造出他所有的美的主角，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永远美妙的主角——是真实。”^{[8] (p. 168)} 这显然也是肖洛霍夫的追求。他的创作以异常敏锐的洞察力和极其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多维度多层次地反映了整个宏大的历史时代的伟大场景，证明了人民在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的生命力和推动力，而且揭示出普通人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心灵的矛盾性，展现了历经无数创伤而走向幸福、越过一切不幸而走向最高道德价值的人民的主题。这些作品本身就是人民在革命道路的不同阶段的命运之书。开始是《顿河故事》，接着是《静静的顿河》，继而是《被开垦的处女地》，后来是《他们为祖国而战》和《一个人的遭遇》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人民意识的成长史。

肖洛霍夫最著名的作品是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1925年，作家在20岁时就动手写作这部长篇，1940年完成，中间历时15年。小说以1912年至1922年间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情节基础，描写了以主人公格里高利为代表的哥萨克人在面临革命与道路抉择过程中，走过的艰难道路。小说的真实性不但表现在作家大量运用了顿河地区的档案资料、真实的事件、真实的历史人物、事件发生的准确日期、真实的命令、决议、电报、传单、信笺、绝对准确的行军路线等，而且最重要的是，小说鲜活地传达了人民生活强劲的脉搏，展现了它全部的欢

乐与痛苦、个体与社会需求的矛盾、个人力量与世袭偏见和传统的斗争。这一点淋漓尽致地体现在格里高利身上。格里高利是哥萨克的典型代表。哥萨克是世界史上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群体，这个词就是“自由、勇敢的人”的意思。哥萨克主要生活在顿河草原等地区，向来以勇敢、剽悍、尚武著称。沙俄时期他们既种地又打仗，所以，既是农民，又是军人。格里高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他期待建立功勋和荣誉，但他身上又具备一些知识分子的特点：爱思索，不盲从，具有独立自主的精神。无论是在历史事件中，还是在家庭生活中，他都处于矛盾的中心和冲突的焦点。在那样一个混乱和动荡的年代里，在那样一个世袭的宗法制社会和家庭中，他意识到人的生命的价值和尊严，终其一生都在寻求真理。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杀人的经历令他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在沙俄军队中，他听到共产党的宣传，于是十月革命到来时，他很快就加入红军并勇敢作战。一段时间后，他对红军军官不经审判就把俘虏全部杀掉又感到困惑迷茫。后来他迫不得已加入白军，之后又逃跑参加哥萨克暴动。然后后悔，重新参加红军，结果红军对他也不信任了。复员回家后村子里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把他当作敌人要逮捕他，逃跑途中他落入匪帮。最后他从匪帮逃出终于回到了家乡。格里高利的摇摆性同样表现在他对个人幸福的追求上：他是麦列霍夫家的小儿子，爱上了邻居的老婆——美丽、刚毅的婀克西妮娅。父亲认为有辱门风，就逼着他去相亲——富人家的女儿娜塔丽娅。他不知自己对婀克西妮娅的爱有多深，立刻就被美丽的娜塔丽娅吸引。娜塔丽娅温柔和顺，对格里高利一见钟情。他们结婚了。婚后他才知道自己对婀克西妮娅根本就放不下。两个女人的爱是不同的。情人的爱狂热、义无反顾，可以跟着他去赴死，但也实际，在他去服役的时候，可以爱着他却和别的男人同居。相比之下，妻子的爱深沉、含蓄，但是，非常忠贞，至死不渝。他就是这样在二者之间徘徊。在他还是个血性男儿的时候，他不理解妻子的爱，不理解她从一个少女转变成少妇时依然葆有的那份羞涩和矜持，因而他不懂得珍惜。他说“娜塔丽娅，你怎么这么冷啊！”他毫不犹豫地带上情人出逃。随着年岁渐长和生活的磨炼，他渐渐明白了妻子宽厚的爱，她给他一个温暖的家，为他养育着一双儿女，操持家务，孝敬老人，善待姑婆，于是他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家后他又不舍婀克西妮娅，仍然和她来往，但这时他开始顾及妻子的感受，不再理直气壮、毫无顾忌，而是尽量不想让妻子知道。但消息还是传到妻子耳中，娜塔丽娅因绝望堕胎而死。他又回到情人身边，带上她准备逃到南方去生活，结果情人中了红军征粮队的子弹，哼都没哼一声就突然死去。一切都落空了，格里高利的眼中天空和太阳都变了颜色——“黑色的天

空和一轮耀眼的黑色的太阳”。评论家叶尔米洛夫在卫国战争前写道“对于格里高利没有爱了，他的爱已经死去，他的生活也不存在了，所以，他看到的是一轮黑色的太阳。我们不知道比此更加虚空的形象，作家对自己的人物进行了如此残酷的惩罚。黑色的太阳就像沙漠上的死亡一样可怕。”^{[9](p.3)}读者被肖洛霍夫深深吸引的正是这种最高意义上的真实，这样的描写方式在今天看来都是无所畏惧的。普里什文在1941年4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听说肖洛霍夫写完了《静静的顿河》的第四部，他甚至不顾斯大林希望圆满结尾的要求，坚持了自己，这令大家都感到惊讶，对于作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诚实。很多作家在赞叹肖洛霍夫杰出天才的同时，也表达了对这个结局的不满。阿·托尔斯泰写道“第四部的结尾在读者中败坏了小说的名声。格里高利这个不振的形象和整个肖洛霍夫创作形象的世界——这个令人想长久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都是那么独特和真实，而这个结尾……我认为就是个错误。”^[10]法捷耶夫一方面承认“很难找到与之相提并论的作品”；另一方面，认为“我们所有人都被结尾伤害了美好的苏联感情。我们对结尾期待了14年，而肖洛霍夫却把我们喜爱的这个人物引向了道德的虚空。”^{[11](p.3)}肖洛霍夫应该早就料到自己可能遭受的谴责，但他选择了坚持自己的历史观点，说出那苦涩的甚至是无情的真相，也许这正是格里高利作为一个人的魅力之所在。

伴随着苏联农村变革的进程，肖洛霍夫在1932年至1960年间创作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反映了集体化运动在顿河地区的推进，以及给哥萨克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肖洛霍夫写道，《被开垦的处女地》是他根据有关1930年发生在农村的事件的鲜明回忆而写成的。这些事件——消灭富农阶级、全盘集体化、把农民都归入集体农庄的群众性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小说真实记录了成千上万的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复杂历程，生动再现了农村旧体制的毁灭和新生活的建立过程，其艰难和痛苦一点也不亚于哥萨克在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所面临的流血冲突。肖洛霍夫依然回避矛盾，而是把农民内部几个阶层之间、农民与白卫军分子之间、农民与党的政策的执行者之间的斗争展现得淋漓尽致，既歌颂了党在摧毁旧体制进程中坚强的领导作用和社会主义新人的诞生，也揭示了其间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严酷现实。《真理报》上评论这部小说是农村别具特色的教科书，是成功解决问题的教材。

卫国战争时期和卫国战争胜利后，肖洛霍夫又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战争小说。他直面战争所带来的悲剧性震撼以及痛苦经验，表现苏联战士对国家、对民族最质朴最深切的情感，他们在战场上不屈不挠，英勇作战，战后同样勇于面对苦难，保有对未来的希望的精神品质。

《一个人的遭遇》是一部史诗性的短篇小说，讲述了普通战士索科洛夫在经历战争的创伤和亲人相继遇难的痛苦后，收养一名流浪儿，继续坚定地生活下去的感人故事。这个人的遭遇意味着整个民族的苦难，而他的刚毅和坚韧既是整个民族不屈精神的展现，也是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伟大魅力的体现。肖洛霍夫所追求的艺术真实深得同时代作家的钦佩。多夫仁科在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会议上承认“我们被那些虚假的激励所左右，除了肖洛霍夫外，都从自己创作的调色板中去除了忧患，忘记了它才是最真实的存在，就像幸福与快乐一样。”^{[12] (p. 309)}

三、人民阅读——肖洛霍夫作品的普及性

肖洛霍夫创作的人民性还体现在其作品在不同社会阶层及文化等级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从普通的集体农庄农民到院士，从白卫军军官到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这些阅历不同、文化素质各异甚至是思想立场完全对立的人，都为肖洛霍夫的作品所深深打动，争相阅读并传颂。《静静的顿河》正好在卫国战争前夜全部完成，有成千上万的人阅读它，把它视为心头最爱。有大量证据表明，卫国战争时期的战士在出发前都把这本书装入行装。作家别洛夫的回忆颇具代表性“第一次听说肖洛霍夫的名字是在9岁时，是从父亲那里听说的。父亲在列宁格勒参加战斗，负伤后在沃洛格达区的一所医院治疗，复原后他回家休假。我清楚地记得他讲述战争、战地医院和他在养伤时读的《静静的顿河》。我记得他因为没能读完这部书是那么难过。”^{[13] (p. 8)}这些回忆证明在卫国战争年代肖洛霍夫的书对于普通士兵具有怎样重要的意义。别洛夫的父亲最终没有读完这部书，短暂的休假后他重上前线“他在查列维奇河岸牺牲了，是我把这本书读完的。”^{[13] (p. 8)}读这本书对于别洛夫来说已经不单是为了知晓接下来的情节，更是为了弥补父亲生前的遗憾。

《静静的顿河》也以其昂扬的精神力量被社会精英传诵。杰出的学者、院士维尔纳茨基在1941年11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静静的顿河》读完了。它将是一座历史的纪念碑，所有社会和政治斗争激流的残酷和激烈以及生活的深层都在其中鲜明表现了出来。我感兴趣的小说鲜明反映并且回答了现实问题，是在陈旧的却以令人惊异的方式保存至今的‘哥萨克’的背景下反映的。”^{[14] (p. 214)}他兴趣盎然地又去寻找作家的其他作品。他在1941年11月15日的笔记中得意地写道“看，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几本科学杂志、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14] (p. 215)}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肖洛霍夫讲述的国内战争的悲剧是如此真实，连来自意识形态不同的、敌对阵营里的人都能接纳。《静静的顿河》中所描写的维申斯克叛乱的领导者之一逃到国外，他在保加利亚去世前写道“我迫不及待地读完了《静静的顿河》，之后嚎啕大哭，为他们的痛苦和快乐——一切都写得那么美，那么可爱……你们会看到和知道那些哥萨克工人怎样在夜晚聚集到我的棚舍内阅读《静静的顿河》，他们流着泪，唱着古老的顿河歌曲。”^{[15] (pp. 157-158)}

早在《静静的顿河》发表之后，肖洛霍夫作品中所渗透的那种伟大的、具有拯救民族精神的弥赛亚意识、那种可以联合一切的力量，就已经为国人所洞察。经过岁月的洗礼，这种精神和力量愈发彰显。它使肖洛霍夫的创作能够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处于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依然焕发出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参 考 文 献】

- [1] 吴岳添主编. 力冈, 等译. 诺贝尔文学奖辞典(1901—1992) [K].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3.
- [2] 汪剑钊主编. 汪剑钊译. 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 阿赫玛托娃诗选, 《安魂曲(1935—1940)》[M].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
- [3] Дворяшин Ю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 А. Шолохов в сознании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J].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школе, 2015, №12.
- [4] РГАЛИ ф. 1517 оп. 1 ед. хр. 111 л. 1.
- [5] Шукшин В. М. Вопросы самому себе [M]. М.: Мол. Гвардия, 1981.
- [6] РГАЛИ ф. 2252 оп. 1 ед. хр. 335 л. 34.
- [7] Катаев И.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народа [J]. Красная новь, 1935, №5.
- [8] Л. Н. Толсто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восьми томах. Т. 1. [M]. М.: “Лексика”, 1996.
- [9] Ермилов В. О Тихом Доне и о трагедии [N].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1940, 08, 11.
- [10] РГАЛИ ф. 2073 оп. 1 ед. хр. 1 л. 106.
- [11] Цит. по: Дворяшин Ю. А. Сталинская премия за Тихий Дон [N]. Культура, 1993, 05, 21.
- [12] Дожженко А. П. Писатели и кино в свете требований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J]. Искусство кино, 1955, №2.
- [13] Белов В. И. Рус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 [N].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Россия, 1975, 05, 23.
- [14] Вернацкий В. И. Коррент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неизбежны. Дневник 1941 года [J]. Новый мир, 1995, №5.
- [15] Цит. по: Прийма К. И. С веком наравне: Статьи о творчестве М. А. Шолохова [M]. Ростов - на Дону: Ростов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81.

[责任编辑 连秀丽]